

论坊市制度与唐宋商品包装的发展

郑超, 黄妍妍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坊市制度一方面符合“重农抑商”政策, 方便统治阶级的管理; 另一方面迎合了封建官僚体制。然而, 对于商品经济发展而言, 它却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阻碍和束缚的作用。坊市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的交易方式, 使得商人漠视商品包装, 因此商品包装相对滞后。然而, 唐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坊市制度彻底崩溃, 在自由市场经济繁荣昌盛, 物质资料生产规模壮大的背景之下, 商品种类繁多, 为保护商品和方便商品运输而出现的包装增多。同时, 人们对商品的外观要求以及与之匹配的包装装饰和保护意识增强, 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带动的科技进步, 对商品包装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键词: 坊市制度; 经济体制; 商品包装

中图分类号: J110.9; F76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100(2011)03-0079-05

On the Development of Square City System and Packaging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

Zheng Chao, Huang Yanyan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Square City system was consistent with "encouraging agriculture suppressing commerce" policy and consolidated the ruling needs to facilitate the management of the ruling class while met the feudal bureaucratic system. But it presented as obstacles and constraints in ter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Square City, a fixed time and fixed place of trading. Traders ignored the external packaging of goods. Howev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mid-Tang dynasty brought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ystem. In a free and prosperous market economy with the background of enriching production resources, the packaging for protection and transport increased together with categories of goods. people also began to demand outside packaging utility for decoration and protection. Th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pelled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also promoted the packaging development.

Key words: Square City systems; economic system; commodity packaging

0 引言

历代经济制度的发展和演变都对当时的商品贸易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该影响不仅涉及交易的方式和时间, 而且直接涉及商品的形式。唐中叶以后, 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的经济

制度——坊市制度彻底崩溃。于是, 在自由市场经济繁荣昌盛, 物质生产规模壮大的背景之下, 商品种类越来越多, 为保护商品和方便商品运输而出现的包装也随之增多。因此, 可以说坊市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崩溃, 与商品的形式, 尤其是商品外包装设计的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收稿日期: 2011-04-01

作者简介: 郑超(1985-), 男, 河南辉县人, 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艺术历史与文化,

E-mail: 286380453@qq.com

1 坊市制度的起源及发展演变

坊市制度是我国古代一种对城市生活进行组织管理的基本制度，主要包括坊市分区、定时启闭、市场经营管理以及夜禁等内容。它是统治阶级试图从时间和空间上严密控制城市社会生活的措施，是集权统治在城市管理中的具体体现。

坊市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商代。因为自商代城中设市起，市即是城中较为固定的特殊区域。西周时，坊市制度逐渐萌芽，当时，无所不包的“王制”即有对城内建置的规划，“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1]。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城市的大量出现，坊市制度基本形成。当时城市的规划管理情形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2]1154}。市有“闾闾”，“闾者，市垣也；闾者，市门也”^[3]。即市以墙垣圈围，设门供人出入；市门由专人把守。“凡市人，则胥执鞭度守门”，市的开合以市官办公处房顶上的旗帜为令，即“上旗于思次以令市”^{[2]1166}。入市交易必由市门出入，故在商业经济一度活跃的战国时代，有“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4]的情形。市内规划亦有记载：“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2]1174}正肆、陈货是列肆销售货物，次、叙是市吏办公的馆舍；当时管理市的官员有司市、胥吏、质人等 30 多人。可见，坊市制度在此时已基本具备了让统治者从时间和空间上控制市内活动的功能。

秦汉时期，坊制有了进一步发展，当时城内的居民区划被称作闾里，即“听闾里以版图”^{[2]1177}。汉代的长安城就有“闾里一百六十”，且布局已比较规则齐整，“室居栉比，门巷修直”^[5]，“街衢相经，廛里端直，甍宇齐平”^[6]。郡县城市规模虽不及京城，但形制相仿。下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坊市则更向规则齐整发展。史载曹魏时期，已用东西大街将邺城分成南北两部分，居民区集中于城南，“其闾阎则长寿、吉阳、永平、思忠”^[7]；北部则为宫殿官署区，全城中轴分明，区划匀称，已初具棋盘式街道布局的雏形。北魏洛阳的规划布局与曹魏邺城一脉相承，坊制亦更加严密。其城内“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合有二百二十里。”^{[8]265}每里“方三百步”，成正方形，可见其规划布局已更向棋盘式方正格局发展了。另外，此时的坊里开始混称，《魏书》记洛阳的居民区划即称“坊”^[9]。而且坊里管理也有了明确记载：“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目的是“虽有暂劳，奸盗永止。”^{[8]255}当

然，其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在于方便统治者控制和管理坊内的居民。

唐代前期的坊市制度更加细致严密。一方面，坊市布局更加齐整。如图 1 所示^[10]，唐代城市的居民区组织称“坊”，市位于城坊中的固定地点。当时各城的坊市数量不一，集中于外郭城中，且布局更加规则齐整。以都城为例，唐长安外郭城的邸第、寺观、编户被南北向的 11 条大街和东西向的 14 条大街纵横分隔为 110 坊（包括两市，如图 1 所示），从而使外郭城布局匀称，整肃有致。另一方面，坊市管理更加严格。其严格的法规和周全的措施足以体现统治者严密控制、完全操纵城市社会生活的用意和努力，反映了商品经济欠发达下“重农抑商”政策占主导的社会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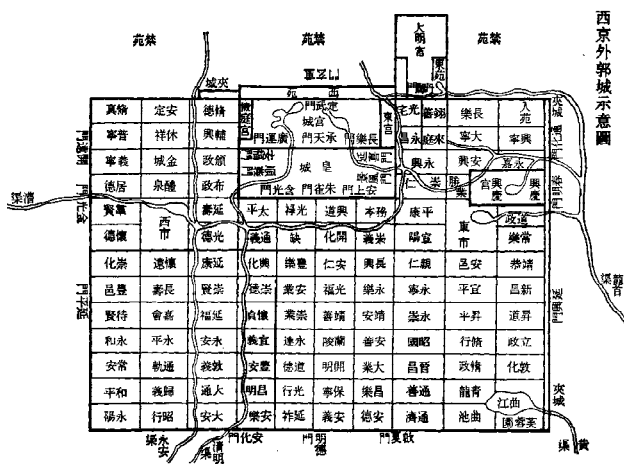


图 1 西京外廓城示意图

Fig. 1 The schemes of western capital outer profile city

中唐以后，商品货币关系强烈地冲击着传统封建政治经济体制。城市作为商业的主要盘踞地所受的影响和冲击更大，突出地体现在传统坊市制度日益不适应新的经济体制的要求，最终导致其崩溃而退出历史舞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商业的活跃使传统体制下单一的、固定的商业经营模式被打破，交易活动不再只限于市内进行，在坊区内出现了众多的商肆店铺。南北朝时兴起的草市更是得到迅猛发展，出现了商机决定市场的格局^[11]。其次，夜市在魏晋以前被严禁，到唐代被弛废后渐趋活跃，并成为主要的交换形式。史载扬州“夜市千灯照碧云”（《全唐诗》卷 301，王建《夜看扬州》），其夜生活的盛况更是“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遮若仙境。”（《太平广记》（第二百七十三卷））后继的宋王朝继承了这一发展趋势，并于太祖年间宣布夜市合法，允许在街旁设店经商，坊市制

度遂彻底崩溃。“太祖乾德三年四月三日，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自三鼓已来，不得禁止。”^[12]

总之，经过2 000多年演化发展而逐步严密细致的坊市制度，随着唐后期商品货币关系的活跃发展而逐渐疲软松弛下来，城市空前地活跃繁荣。这是封建经济，尤其是其中的商品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调适封建政治、经济体制矛盾的自为办法。

2 坊市制度下的经济体制特征及其变革的必然性

农业是奴隶制和封建经济体制的根本，但商业又是社会经济得以维系和正常运转所必须的。统治者一直在二者之间进行调适，以符合奴隶制和封建制统治的要求。事实证明，在社会发展处于一定阶段时，坊市制度基本满足了这一要求。坊市制度是与“重农抑商”的封建经济制度相匹配的，是保证重农政策顺利实施与封建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同时又是“工商食官”制度的最佳体现。这是坊市制度下的经济体制特征所决定的。

第一，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总量，即经济水平之下，坊市制度既保证了自然经济下对商业的依赖性，又满足了奴隶制和封建制对商业税收的需求。但到唐代中叶，随着江南地区的全面开发，经济重心向南迁移，唐王朝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调整。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在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等方面都有着很明显的表现，赋役制由租庸调到两税法的转变是很重要的标志。”^[13]这样，两税法实施以前经济对市场税收的过分依赖和物流与交换渠道的过于狭窄的矛盾不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而且坊市崩溃后的多元市场更有利于增加政府收入，同时刺激商品生产，满足包括统治阶段在内的多个阶层民众的物质需求。

第二，坊市制度与奴隶制和早期封建手工业生产经营方式一脉相通，形成了一个政府垄断控制生产、经营和消费的有机链，符合“重农抑商”政策和巩固统治的需求。但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催生出“两税法”以后，私营手工业长期被抑制的格局无法维系，此时农民的剩余产品可以拿到市场出卖，这种情形有利于整个封建经济的繁荣。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唐中叶后手工业者所经营的作坊，诸如织锦坊、纸坊、染坊、冶成坊（冶铸手工业）、铜坊（铸造铜器）等，比以前有显著增加。而且有的私营作坊规模相当大，定州（河北定县）富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太平广记》引《朝野僉载》），

即是明显的例证。而坊市制度下，手工业由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主要生产武器等军用品和供官府、贵族消费的生活用品。带来了生产成本过高以及平民生产生活物资无法得到满足等弊端。

第三，坊市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封建官僚体制，也体现了商人官僚化和官僚商人化的特征，但与中国古代加强中央集权、稳固统治的愿望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早期表现并不突出，因为市场与政治中心往往合二为一，或者市场靠近政治中心，能满足早期官僚体制之下官僚对俸禄以外的经济利益的追逐。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坊市制度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满足官僚体制下各级各类官僚，尤其是下层官僚的需要，而且底层民众营生手段的单一性时刻动摇着封建统治的根基。所以，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便允许所有官吏在乡村及坊市开设邸店、经纪求利，一律按照百姓例差科。这种变革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各级官吏的愿望，同时也活跃了自然经济。

第四，从本质上说，坊市制度是商品经济欠发达的表现，它虽然是自然经济的必要补充，但同时又束缚了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坊市制度中对于市的建置和各种管理制度，无一不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在“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下束缚和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方针。以唐代的坊市制度为例：首先，市有官设。所有大小市场——不论是两京还是州府县治，市的设立和废止，都是以朝廷的命令行之，即所有的市都是官市，并都是由朝廷设官管理的。其次，市必须设在城内的固定地点，成为城内的一个特殊区域。在市的规划和格局上一直遵循着“前朝后市、左祖右社”。这种安排从一开始就是遵循封建主义的哲学和由此派生出来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为商业活动制造障碍，以便能够遏制商业的发展。再次，限制交易时间。尽管市内的肆铺邸店是常设的，但是交易时间却仍保持日中为市的古制，并不是全日营业。因市是城中坊制的一部分，坊皆有墙和门，市亦不例外。除此之外，唐代官吏对于市内的商品物价以及坊市中店铺的规模也有控制。官家对于市场的严格管制以及对市场中工商业者交易行为的制约，使得商品经济从时间和空间上都受到了束缚，因此，商品经济自身难以发展。

3 坊市制度的崩溃及其与商品包装发展的关系

唐代时期，尽管坊市中的商品是人们生活中的

必需品,但是与自由市场的商品销售相比还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坊市准入的门槛过高。设置准入门槛的原因是统治者旨在保护封建官僚手工业和封建专卖制度,民间和私营商业难以进入,从而使其缺少竞争性。二是坊市制度下商品销售的竞争性受到限制。由于缺乏增加商品附加值的意识,在坊市制度下,商品从生产作坊到销售市场是不需要,或者说基本上是不需要包装的,甚至有些商品直接在销售地生产。

除此之外,坊市制度下残存的家庭手工业也无需注重对产品进行包装,因为其所注重的是产品本身的技术秘诀。《唐六典》中在对工商业定义时,特别指出:“工商皆为家专其业以求科者。”技术的传授与训练,是自古以来历久相沿的传统制度,并非唐代独有,但到了唐代却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试以一例为证:据白居易《白孔六帖(卷十四)》记载,“宣州诸葛氏能作笔,柳公权求之,先与三管,语其子曰:柳学士如能书,不尔退还,即以长笔与之。未几,柳以不入用,别求笔,遂以常笔与之。先与者三管,非右军不能诸葛笔也”。这个实例证明,产品在市场上畅销凭借的是产品本身的名气和质量。家传的技术秘诀使得产品的优质特点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从而多产多销获得利润。所以,史载唐中叶以前,家庭手工业产品只重其内而轻其外,不注重商品的外包装,使得这个时期的包装销售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随着坊市制度在宋代的彻底崩溃,商品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唐代的城市多趋于行政中心,而宋代市镇则趋于工商业化;唐代都市内的贸易地区由官员严格控制,宋代则更加自由;唐代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将商业区和居住区分开,居住区内禁止经商,而宋代逐渐打破了坊市格局,允许商人经商,街道上随处可以开设店铺。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坊市制度的突破,城市和集镇迅速兴起。北宋都城汴梁商店、旅店、酒楼、货摊遍布街道两旁;手工业作坊众多,涉及160多种行业;有6000余大中型商家,8000余小商小贩^[4]。商品有来自各地的水产、牛羊、果品、酒、茶、纸、书籍、瓷器、药材、金银器、生产工具等,还有来自日本的折扇,高丽的墨料和大食的香料,还有热闹的夜市和早市。在城市周围和乡村的交通要道逐渐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集市。北宋中期,“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懋迁往来,日取富足”^[5]。这个时期官府对商业活动的干涉和管制减少,自由市场迅速发展。一方面,市

场规模逐渐扩大,市场数量大量增加,进入市场流通的商品数量不断增多,市场上的商品种类较之前代更加丰富;另一方面,商品的储运要求增强,对包装要求越来越高,这就促进了两宋商品包装在数量、规模、形式、品种、设计风格上的多样发展。

坊市制度崩溃之后,手工业的迅猛发展为包装技术和包装材质等方面提供了物质基础。宋代具有代表性的手工业有5个类别:一是矿冶业。宋代对金、银、铜、铁、锡的开采和冶炼规模都相当大,为宋代金银器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原材料。从现存的两宋包装中,我们还可见到不少做工精美的金器和银器工艺包装。二是纺织业。北宋的纺织业以丝织业最为发达,丝织品被运用于礼品的内包装;而当时的棉布也较多地运用在民间的较简易的包装中,将具有地方特色的花布图案将商品轻轻一裹,再用麻线或棉线束紧,或制作简易的麻袋或布袋,成为了民间较为多见的简易包装形式。三是制瓷业。宋代瓷器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宋代瓷窑遍布全国且各具特点,精美的瓷器不仅被当作日常用具,而且广泛用作包装容器。考古出土物表明,瓷器被用于酒包装、文具包装、化妆品包装、茶包装、食品包装等方面。四是造纸业和印刷业。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繁荣,宋代的纸包装运用相当普遍且以图文并茂的印刷形式广泛地运用在商品包装中。手工业中与包装有直接关系的是印刷、丝织、陶瓷制品和其他各种材料所制作的装饰品,这些手工业制作在宋代取得的巨大成就促进了包装技术的革新。

4 结语

综上所述,古代包装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商品经济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从坊市制度的发展演变和其经济特征来看,坊市制度一方面是为了迎合封建官僚体制,另一方面是为了方便统治阶级的管理。然而对于商品经济发展而言,它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阻碍和束缚的作用。坊市制度规定在固定时间交易,造成了包装与商品的非同步的发展;同时,固定地点的交易方式,则使得商人忽视销售品的外在包装。唐宋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冲破了坊市制度的障碍,在自由市场经济繁荣昌盛,物质资料生产规模壮大的背景之下,市场上的商品种类繁多,为保护商品和方便商品运输而出现的包装增多了。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商品的外观以及与之匹配的包装装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

商品保护的意识也逐渐增强,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带动的科技进步,对包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戴德.大戴礼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281.
Dai De. Dadai Liji[M].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7: 281.
- [2] 林尹.周礼今注今译[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Lin Yin. Comments For Modern Translation Zhouli[M]. Beijing: Academic Bibliography Press, 1985.
- [3] 崔豹.古今注[M]/[佚名].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44.
Cui Bao. Ancient Note[M]/[Ano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Photocopy.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83: 144.
- [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2.
Si Maqian. Historical Records[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132.
- [5] [佚名].三辅黄图[M]/[佚名].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363.
[Anon]. Sanfu Map[M]/[Ano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Photocopy.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83: 363.
- [6] 张衡.西京赋[M]/曹余章.历代文学名篇辞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269.
Zhang Heng. Xijing Poetry[M]/Cao Yuzhang. Famous Poetry Literary History.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1990: 269.
- [7] 左思.魏都赋[M]/曹余章.历代文学名篇辞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427.
Zuo Si. Weidu Poetry[M]/Cao Yuzhang. Famous Poetry Literary History.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1990: 427.
- [8]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M]/陶宗仪.说郭一百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Yang Xuanzhi. Luoyang Jialan's Record[M]/Tao Zongyi. About Guo One Hundred Books.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7.
- [9]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4:63.
Wei Shou. Wei History[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4: 63.
- [10] 徐松.增订唐宋两京坊城考[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255-257.
Xu Song. Addition of the Two Capital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 Town Square[M]. Xi'an: Sanqin Press, 1996: 255-257.
- [11] 朱和平.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与封建经济体制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134.
Zhu Heping. A Study of the Commercial Economy and the Fedual Economic of Organization in the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M]. Huhehaote: Neimenggu People Press, 1998: 134.
- [12] 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七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5:395.
Xu Song. Song History: Products[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395.
- [13] 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M].北京:中华书局,1986:168.
Zhang Zexian. Tang Tax Corvee History[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168.
- [14]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566.
Meng Yuanlao. Dongjing of City Life[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al Literature Press, 1956: 566.
- [15]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477.
Liu Zehua. China's Political Ideas[M].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6: 477.

(责任编辑:蔡燕飞)